

浙江华侨史料

浙江侨史研究室[编]

一九八六年浙江华侨史料

目 录

- 一、温州旅欧华侨与对外开放……………章志诚（1）
- 二、青田华侨特点初探……………周望森（12）
- 三、维护国格的傅雷——记傅雷赴法留学途中
 二、三事……………洪永川（25）
- 四、异国他乡坎坷途——第三届全国侨联委员
 朱祥先生国外侨居生活纪实……………陈国吉（29）
- 五、难忘的峥嵘岁月……………李南星（38）
- 六、海外赤子心怀祖国——忆旅法华侨赈灾和
 支援抗日募款的概况……………洪永川（62）
- 七、培育华侨子弟的摇篮——海南侨中简史
 ……………蔡俊（64）
- 八、宁波大碇镇华侨出国初探……………范学文、戴有旺（68）
- 九、阿拉是中国人……………胡云湘（72）

温州旅欧华侨与对外开放

章志诚

温州是浙江省的著名侨乡之一。全市侨胞十万人，分布在世界四十七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大部分侨居欧洲各国。他们是温州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力量，也是温州同欧洲各国人民发展友谊的桥梁与纽带。因此，认真做好温州旅欧华侨的工作，充分调动旅欧华侨的积极性，对于振兴温州经济，建设四化，具有重大的意义。本文拟就温州籍旅欧华侨与对外开放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一、温州人民移居欧洲的历史

温州人民移居海外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南宋淳祐年间（公元1241—1251年）永嘉人王德用，因科举屡试不中，遂与其兄“尽卖其田庐”^①，伪造国书，携带违禁品，赴交趾（今越南）经商，拜见交趾国王。国王大喜，亲“与宴会”^②。之后，国王“以德用才艺而敏给，厚礼留之，遣乃兄回”^③。从此，王德用遂留居交趾。

继王德用出国之后，又有永嘉人薛氏抵真腊（今柬埔寨）。据周达观在《真腊风土记》“异事”条云：“余乡人薛氏，居番三十五年矣”^④。查周达观于元朝成宗元贞元年（公元1295年）奉命随使赴真腊，次年（即公元1296年）至该国，居住一年许始返。由此推知，薛氏早于南宋景定年间（公元1261—1262年）就始居真腊了。

南宋末代宰相陈宜中，永嘉人，因抗元失败，遂赴占城（今越南南部）乞兵。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元军伐占城，宜中赴暹（今泰国）^⑤，而留居基国。

宋、元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温州人民移居海外的逐渐增多。但是，温州人民移居欧洲，则是近代的事。中英鸦片战争以后，特别是一八七六年温州被辟为商埠后，温州人民开始赴欧经商或谋生。据宋恕一八九六年八月十二日《日记》所载：《七月初四日（即阳历8月12日），始识田合通》^⑥。同年十月中旬，宋恕在《致孙仲恺书》中又云：

“田合通，曾一晤谈，原籍吾郡人，现已入德国籍，其母及其妻皆系西女；此番因为到日本办货，路过上海，据说生意每年多者十万（两）左右，利息约有五、六千室（两）左右，不知其家底若何？其人不过西国一平常商人，粗通数国文字，非能讲士大夫之学也。”^⑦由此可知，田合通路过上海前“已入德国籍”了，而且侨居德国已久，能“粗通数国文字”；且说“其母及其妻皆系西女”，那么，田合通一八九六年八月来上海时当二十岁的话，田合通之父当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即定居德国，而田合通已成为德籍华人了。笔者估计，田合通之父很可能是温州侨民中旅居欧洲最早的一个。

继田氏之后，文成县玉壶区东头乡黄河村胡国恒，随其在青田县的舅父到欧洲经销青田石腊，不久，他又随其舅父到南美阿根廷贩卖青田石雕。一九一一年，文成县朱雅乡下龙村蔡元利（又名蔡声皆）赴法国谋生。

以上早期旅欧的华侨获利的消息传到本乡，又吸引了一批人到欧洲经商或谋生，但是大批的温州人民旅欧，是在一九三〇年二月，“汇集在广州等船去法国谋生的青田、温

州、瑞安、乐清等地的人就有一百四十多人，其中青田鹤城镇就有三十八人，乐清白象最多”^⑧。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温州人民出国达到了高峰。这两年中，仅文成县赴意大利、法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罗马尼亚等国谋生的就有二百一十六人^⑨。

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多年来，由于温州籍华侨在欧洲实业的发展，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以及同欧洲许多国家外交关系的建立，为温州人民旅欧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到一九八四年末，全市旅居欧洲的华侨共有四万余人。

二 温州籍华侨旅居欧洲各国的概况

据有关侨情资料介绍，温州、青田籍华侨在欧洲各国的分布情况是：

1、侨居社会主义各国的情况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到一九五七年止，有华侨七十九户，一百九十人，其中从国内去的约有七十人。“华侨多为浙江青田人，侨居时间一般在五十年以上”^⑩。近三十年来，温州人民又有一些人旅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据一九八四年末统计，温州市鹿城区和文成县共去三十七人。他们分居在东柏林、莱比锡、卡尔·马克思城三地。

波兰人民共和国：据一九五九年末统计，有华侨四十四户，一百一十七人。他们中多数居于华沙、罗兹两地，原籍以浙江青田人为多^⑪。近几年，温州市鹿城区又去了十三人。

此外，还有一批温州籍华侨旅居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当中有的同居住国妇女结婚，加入外国籍，成了外籍华人。

2、侨居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情况

英国：华侨及华裔人口总数二十三万人^⑫。其中温州籍华侨四百余人。他们集居伦敦、利物浦、卡迪夫、曼彻斯特等城市。

法国：华侨及华裔人口总数二十一万人^⑬。其中温州籍华侨二万人。他们集居巴黎及近郊歌梅驿、里昂、里尔、马赛等城市。

荷兰：华侨及华裔人口总数五万五千人^⑭，其中温州籍华侨一万三千人。他们集居海牙、阿姆斯特丹、鹿特丹等城市。

比利时：华侨及华裔人口总数三千八百人^⑮，其中温州籍华侨三百人。他们集居布鲁塞尔、昂维斯等城市。

西德：华侨及华裔人口总数约一万八千人^⑯。其中温州籍华侨五百人。他们集居莱茵河流域的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埃森等商业或工业城市。

奥地利：华侨及华裔人口总数四千人^⑰。其中温州籍华侨三百人。

瑞士：华侨及华裔人口总数三千人左右^⑱。其中温州籍华侨为数不多。据一九八四年末统计，温州市鹿城区和文成县旅居瑞士的仅有六十一人。他们集居日内瓦。

意大利：华侨及华裔人口总数五千五百人^⑲。其中温州籍华侨约有四千人。他们分居在米兰、威尼斯、布罗加、佛罗伦萨、罗马、热那亚、都灵等城市。

西班牙：华侨及华裔人口总数三千人^⑳。其中多半是青田、温州籍华侨。据一九八四年底统计，温州市鹿城区和文成县旅居此国的有一百七十二人。

葡萄牙：华侨及华裔人口总数约二千人^㉑。其中温州、

青田籍华侨约有一千人。他们分居在里斯本、科阴柏等城市。

此外，旅居北欧的瑞典、丹麦、挪威三国的华侨及华裔人口总数为七千五百人^㉒。在北欧三国的侨民“浙江青田籍的侨民仍占多数”^㉓。据一九八四年底统计，温州市鹿城区旅居北欧三国的有五十五人。他们分居于丹麦的哥本哈根、奥斯胡，挪威的奥斯陆，瑞典的斯德哥斯摩、哥德堡。

从上述各国的情况看，温州籍华侨大多数是侨居法国、荷兰、意大利三个国家。

三 温州籍旅欧华侨职业的变化

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近百年历史看，温州籍旅欧华侨的职业结构的变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八九六年至一九三九年。在这近半个世纪中，是温州籍旅欧华侨的艰苦创业时期。这个时期，有少数华侨从事经商活动；而大多数华侨则从事小商小贩活动，如贩卖领带、纸花、眼镜、小皮夹、人造首饰、绸布等零星物品；另有一部分人从事苦力劳动，如做粗工、制红砖、捣石子等。

第二阶段：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九年九月。这近十年中，是温州籍旅欧华侨开始发家时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军事工业生产，忽视民用工业生产，造成了欧洲人民生活必需品空前紧缺。鉴于这种情况，温州籍华侨便趁机创办民用小工业。一九四〇年，文成籍旅法华侨董玉琳、陈体济、金东鸿、洪志如和青田籍旅法华侨留益声五人合股开设了一间皮革工场。由于这时欧战正在进

行，皮源缺乏，不到两年，这间皮革工场就倒闭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温州籍旅欧华侨又创办了一些服务性行业和民用小工业。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九年，文成县有二百零四名华侨在荷兰、法国、意大利三个国家开设餐馆、创办皮革工场、木器工场等等^②。

第三阶段：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八六年十月。在这三十七年中，是温州籍旅欧华侨的实业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温州旅欧华侨的实业有了较大发展，资金日趋雄厚，其职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从侨居欧洲社会主义各国的华侨职业构成上看，他们大多数是从事服务性行业和小商小贩。例如：侨居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青田籍华侨，“大部分从事商业活动”^③；侨居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华侨大部分从事制鞋业”^④；侨居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共和国的华侨，开设餐馆，制纸花、领带、玩具等，有的在当地服务性行业从事苦力劳动。

其次，从侨居欧洲资本主义各国的华侨职业构成上看，他们主要是从事餐馆、皮革、服装、木器、杂货、洗衣等行业。例如文成县侨胞，他们中在荷兰、意大利、法国三国经营餐馆、皮革、木器、百货等行业的就有二百四十多家^⑤。

随着旅欧华侨实业的发展，华侨的经济地位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据一九八五年春温州市赴西欧经济考察组对荷兰、比利时、法国、意大利四国考察，温州籍旅居上述四国的华侨，其经济状况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经济财力雄厚的华侨，约占华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第二类，经济有所积累的华侨，约占华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第三类，经济生活比较差的华侨，约占华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⑥。

四 温州籍旅欧华侨的特点及其对祖国、家乡的贡献

综观温州籍旅欧华侨的历史，他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具有勇敢勤劳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无论是早期旅欧的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旅欧的温州籍华侨，绝大多数都是贫苦农民和城乡手工业者。他们在欧洲各国所从事的职业，开始都是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使在欧洲各国做小商、小贩的侨胞，他们的生活也十分艰苦。他们常常是三五个人或者六七人挤着一个狭窄的小房间，天亮了匆匆上街，一直到太阳落山之后才回到贫民窟的小客栈睡觉。他们“这种近乎挣扎的生活，要不是具有刻苦耐劳的性格，决不能维持”^⑦。据文成县侨联调查：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县有二百零四名华侨之所以发家致富，成为一九四九年后出国的二千八百多人的“奠基人”，就是依靠他们的勇敢勤劳、艰苦创业的结果。

第二，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他们身处异域，寄人篱下，受洋人剥削和欺凌。他们盼望祖国富强、国际地位提高，使自己在国外的权益能够得到保护。因此，他们富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

抗日战争期间，旅居欧洲各国的温州、青田籍华侨，提出了“亡国宁肯亡家”的激动人心的爱国口号，成立“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出版《祖国抗日情报》等刊物，放映爱国影片，发动华侨慷慨献金，支援祖国抗日救国。一九三九年七月八日，由温州旅欧华侨童启迪等八人发起，向温州、青田籍侨胞募捐。据童启迪、陈则敬、单全普、叶秀甫、徐予青、任岩松、杨岩生等一百八十一人统计，他们共捐得法郎七千七百方（合国币一千四百元，每方零八生丁合

国币一元)，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⑩。

第三，具有浓厚的爱乡思想。建国三十多年来，温州籍旅欧华侨和旅居世界其他各国的温州籍华侨一样，在支援祖国革命和家乡建设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具体表现在：

(1) 向家乡投寄外汇。据文成县侨联统计：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八四年底，赡养国内家属和捐赠资助兴办公益事业的汇款，累计达一千八百三十一万余元，其中属捐赠、资助的有四十一万七千五百余元^⑪为家乡修建校舍十三处，兴建影剧院四处；据瑞安县侨联统计，仅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六月，侨胞捐资办家乡公益事业的就达八十九万元。旅法华侨林昌横、任岩松，旅荷华侨总会等愿资助温州大学建教学楼。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四年底，温州旅居国外华侨向本市汇款，共计四千六百五十四万三千余元^⑫。

(2) 帮助家乡兴修水利。文成县旅欧华侨，资助兴建水库、小水电站、水井等。瑞安县丽岙乡旅欧华侨，自一九四九年十月至一九八三年六月，捐资支援丽岙乡建灌溉渠六条。

此外，温州籍旅欧华侨还大力帮助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

五 继续做好旅欧华侨的工作

温州市是我国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温州籍旅欧华侨历史悠久，人数众多，是温州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有利条件之一。国务院要求我们“进一步调动广大群众和各方面人士的积极性，进一步做好海外侨胞的工作，开创对外开放的新局面。”^⑬

那么，在对外开放工作中，如何做好温州旅欧华侨的工

作呢？笔者建议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做好以下几个工作：

第一，要向华侨、归侨和侨眷进行爱国主义宣传，认真做好侨胞的思想政治工作。据一九八五年春温州市赴西欧经济考察组赴欧访问了解，华侨中的第一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出国的老华侨，这批人约占华侨总数的百分之十；第二代，是五、六十年代出国的中年华侨，这批人约占华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第三代，即在近十年出国的青年华侨和在国外出生的年幼华侨，这批人约占华侨总数的百分之七十。而老华侨大部分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出洋谋生，饱受风雨，经历新旧社会不同地位的对比，具有浓厚的爱国、爱乡思想；而近几年出国的青年华侨，有的受“十年动乱”的影响，有的则羡慕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些青年华侨中有的爱国观念比较淡薄；年幼的华侨“洋里”生、“洋里”长，他们不但与祖国没有联系，而且“国外又乏侨校，自不能受到祖国文化的熏陶，再加上母系的影响自然而然为其他国家所同化了。”^⑭

鉴于上述情况，笔者认为，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形式向温州籍旅欧华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祖国文化知识的教育。对此，文成县旅荷华侨胡志光先生，已看到对华侨第二代、第三代教育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一九七九年，胡先生在荷兰的乌特里基创办了一所中文班；稍后，他又把办中文班的经验逐步推广到各个大中城市。到一九八三年底止，共办了七个中文班，参加学习的侨胞子弟达七百余入。这一措施，对于防止侨胞后代的“同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对旅欧华侨进行宣传教育的同时，还必须对归侨和侨眷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支持与鼓励他们与国外亲属、朋友联系，争取他们爱国、爱乡，保持中华民族的气节，为祖国、

家乡的四化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二,要进一步落实各项侨务政策,调动广大侨胞的积极性。据一九八五年春温州市赴西欧经济考察组赴欧访问了解,旅欧华侨迫切要求党和政府落实华侨、归侨和侨眷政策。如落实华侨私房政策,纠正不正之风,有关部门在接待华侨中,不要把眼睛集中在有钱的华侨身上,对钱不多的或者没有钱的华侨,要“一视同仁”等等。对他们的合理要求和正确意见,各有关部门,特别是侨务工作部门要引起重视,抓紧落实各项侨务政策。

第三,要健全各级侨务工作机构,加强侨史研究工作。温州旅居海外的华侨人数众多,分布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对侨居国的开发和经济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根据这一情况,为做好海外侨胞的工作,必须健全各级侨务工作机构,充实人员,抓好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工作;同时,也要重视侨史研究工作。除组织人员对侨乡调查了解侨胞的历史与现状外,也可组织人员到国外了解访问侨胞,收集资料为编写温州华侨历史做好材料准备。如有条件,也可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温州旅欧侨团,编写《温州旅欧华侨史》,以教育青年华侨及年幼的华侨、华裔。这是一项不容忽视的战略性工作。

总之,做好华侨、归侨和侨眷的宣传教育工作,进一步落实各项侨务政策,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温州市进一步对外开放,振兴温州经济是有益处的。

〔注释〕

①②③ 俞文豹:《吹剑录外集》。

④ 周达观:《真腊风土记》“异事”条;夏鼐:《真

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8—179页。

⑤ 《宋史》卷418;《永嘉县志》卷34。

⑥⑦ 参见胡珠生:《宋恕全集》稿卷八《家书》。

⑧ 陈国吉:《赤子沧桑》,《浙江省华侨历史研究室资料汇编》,1984年第1期。

⑨ 王忠民:《文成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历史和现状概况》。

⑩⑪⑫⑬ 《华侨情况介绍》,福建省华侨事务委员会办公室1963年编印,第68—69页。

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 《华侨经济年鉴》,台湾华侨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编,1983年出版,第451—458页。

㉓㉔㉕ 徐斌《欧洲华侨经济》(全一册),第79页;第24页,第88页。

㉖㉗㉘ 参见王忠明:《文成县华侨、外籍华人和港澳同胞概况》。

㉙ 参见温州市赴西欧经济考察组:《关于访问西欧四国华侨情况的汇报》稿。

㉚ 参见1939年7月21日巴黎出版的《祖国抗日情报》(中文版)第629页。

㉛ 根据中国银行温州分行提供的资料。

㉜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对外开放有关问题的批复。

辛志诚修改于

1986年11月6日

青田华侨特点初探

周望森

地处浙南山区的青田县，历来以贫困闻名。但它有为数较多的华侨，是个著名的侨乡。

（一）青田华侨的产生和发展

有人说，青田华侨象孙悟空，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又像他那样，一个筋斗翻到十万八千里之外。这个比喻颇为形象地说明青田华侨产生的历史特点。

青田华侨的诞生是与青田石雕出洋密不可分的。青田盛产叶蜡石，质地细腻，光洁如玉，是石雕和印章等美术工艺品的上等原料。它的开发利用，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到了清初，这一产于偏僻山区的工艺美术品竟越出故土，由青田第一批华侨携带出国销售。“据民国二十四年版的英文《中国年鉴》刊载，早在十七、十八世纪年间，就有少数国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从商，初期前往者以浙江青田籍人为多，贩卖青田石制品”。（1）又据该县山口村在清末去俄国销售青田石雕的季美楷说，“早在道光末期（约1842年）就有一批青田人到彼得堡、明斯克一带卖过石雕”。（2）青田石雕引起了西方人士的极大兴趣和重视，被人们誉为“罕世奇货”。

十九世纪中期（即四十年代），中英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中国大门被西方资产阶级打开，中国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

市场。这就给青田石雕出洋和青田华侨发展造成新的契机。一八五三年青田石雕在南美的洛易赛会首次展出，并获奖，此后，多次在巴拿马博览会等国际展览中获奖，青田石雕更蜚声于世，这无疑给青田华侨出国销售青田石雕以巨大的刺激。方山乡杨灿勋先去欧洲。接着林茂川设计了不少既时髦又轻巧实用的石雕品，如刻花烟缸，烟插，书夹，屏风，花瓶等等，亲往欧洲推销。稍后，该村著名石刻艺人林茂祥及长次令嗣先后遍历五洲。不久山口村季兆璠等七人贩卖石货，自南洋群岛及印度，转辗至法兰西境，营业日见发达。于是群相效法，纷纷以出洋贸易为能，视远历重洋为村市。

迄本世纪二十年代，青田出国人数骤然猛增。一方面，由于一九一五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了“万国巴拿马赛会”，青田石雕高手傅延奎、林质成、金茨真、周芝山等二十余人的作品展出后产生强烈反响，均获头奖。这给青田石雕打入国际市场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另一方面，这个贫困山区在军阀的黑暗统治下，天灾人祸相逼，多有饿毙者，于是以青田石雕出洋，便成了人们谋生活命之道，遂形成青田民众第一次出国高潮。据调查，截止民国二十年（1931年）方山乡裘山村，一百二十三户，即有一百二十五人出过国或正在海外，有的一户七兄弟全部出洋。（3）阜山乡同宅村出洋情况也差不多。据邹韬奋先生估计，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青田华侨出洋高峰数为三、四万人。（4）现在仍健在或刚谢世不久的老华侨、老归侨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在那次出国热中离乡的。不过这时期的青田华侨已不再清一色地以推销青田石雕为业，他们到欧洲等地侨居一段时间后，即改营其他小商品的贩销了。

三十年代后期，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青田海外华侨处境艰难，出洋热冷却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旅欧青田华侨大批归国，青田海外华侨人数锐减。

建国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经济向民用经济回复，华侨境遇相对的安定，特别是我国政府对海外侨胞采取保护政策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青田人出国从停顿状态，又陆续回升。进入八十年代，国家开放政策促成了华侨第二次出国高潮。据统计，至一九八〇年海外青田华侨总数有五千多人。近几年出国人数猛增，目前在海外的青田籍华侨总数已达万余人。

他们既不是招募的契约华工和被贩卖的“猪仔”，也不是由海路或陆地就近移居境外，开发东南亚等落后地区而产生，而是以青田石雕为媒介，作为小商小贩三三两两地由陆路北上，经西伯利亚，长途跋涉到达欧洲；或飘洋过海，东渡日本，西游欧美，散居广阔的外域世界，活跃于各发达国家和地区，从事小本经商活动。

（二）青田华侨的历史特点

青田华侨在青田石“母胎”内孕育起来并降生，这是它的先天特性。这一特性又直接间接地派生出一系列具体特点。

第一，具有散居世界各地和分散活动的特点。既然不是成批的华工定向出国，定点受雇，也不是成群结队约定越境，定点从业，而以“跑码头”谋生的青田华侨，不能集居某国某地。他们肩挑手提青田石雕出国，出国后又以销售青田石雕或转为贩销其它小商品为业，这样的经济活动只能分散进行，各辟蹊径。所以分散活动是他们这些小商小贩的经营

特点。这固是他们的经济活动所使然，更由于他们没有多大包袱压身，没有工厂企业，商店地产，也没有家小和坛坛罐罐，凡闻某国某处有利经商，或被洋警察驱赶，随时都可以卷席而去。在一国一区内，走南闯北，忽东忽西，今日一城，明日一村，乃至挨家逐户叫卖，与国内“鸡毛换糖”的货郎担很相似。这样，在一个幅员不大的国度内，也有多处华侨商人的居住点，在联邦德国，西柏林，汉堡，波恩，科隆，不来梅，慕尼黑，法兰克福等地都有青田华侨的居住和活动。但他们并非集中在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内，而是穿越国界，跨越大洲，到处奔波，浪迹天涯。据已故归侨周柄才、周克孝等的回忆，在欧洲的青田同乡，侨居一二十年，转辗十几国的不在少数，他们自己就到过二十个左右的国家，几乎跑遍西欧、北欧、南欧和波兰、苏联。目前仍健在的七十七岁的周邦友，离乡已六十年，先到法国，后去德国，转辗中、南欧各国，最后横渡大西洋，到达美国才定居下来。可以说，世界五大洲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都有青田华侨的足迹。但绝对分散中有相对的集中，日本和西欧就是两个相对集中的地区，两者又以西欧为最。青田旅居西欧的华侨数是全国最多的县份之一。可以说，要了解和研究青田华侨历史，主要得从西欧和日本着手。

我们还看到，青田华侨和华人，独在东南亚这个华侨、华人最集中并占全世界华侨、华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新开发地区为数极少；被西方侵占的港、澳地区也只是青田旅外者的途经之地，留居者只有区区之数；美国西部、澳大利亚、南非等上世纪以来依靠大批华工才得以开发的“黄金地带”，青田华侨、华人也属鲜少。在新开发的地区和港澳这样的世界贸易中心青田华侨为数很少这种状况，足以说明他

们难以进入先进经济行列，尚未形成如同“宁波帮”、福建的“漳泉帮”、广东的“台山帮”等人数达万计的群体，经济上不易随着侨居地的经济起落，两极分化，产生实力雄厚的产业、金融业集团。

第二，如同我国历史上的传统商贩，一人外出，眷属不跟，青田华侨多为单身汉。

在二十年代出国高潮及其后出国的青田华侨，绝大多数的都是单身出国的。一人出走，眷属不跟，全家移居的是极少。阜山乡是青田县华侨集中的大乡之一，自第一批华侨产生到现在，华侨累计数已逾千人，但建国前带家属出国的不超过十家。就整个情况说，那时青田在海外一个华侨，在家乡就有一个家眷，比例基本上是一对一。这与办实业的，或就近移居东南亚的兄弟省华侨不一样。我国历史上的传统商贩在国内经商大多一人外出，妻室在家，身在外埠，心挂亲人，白天到处奔波，晚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秋天到了，“秋思”绵绵，挨到冬天，则是盘缠在腰，回家团聚。青田华侨离乡经商，权居异国，亦复如此，他们只是中国传统小商贩向外洋闯荡，延伸途程而已。“安土重迁”而在海外又无可观产业的山间百姓，都有浓厚的“叶落归根”的观念，是不想全家远去的。客观的和社会的原因，则是他们经济力低下，所获小利不足以将全家安置在水准很高的发达国家里生活；而二十年代后期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不景气和随后到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他们全家大小向外移居。为家里所系，他们的爱国思乡观念不曾淡薄下去，内向力非常强固，随时都准备收摊卷席回归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青田旅欧华侨纷纷回国，海外人数锐减，其大部分人自行归来，就是基于上述种种原因而产生的必然现象。

象。

第三，建国前青田华侨的经济，基本上属于维持自身和眷属生活的消费型经济，极少一部分则转化为封建性的经济。

青田华侨，在海外以小本经商，大多无厚利可图，所得小利则不足以创办实业。他们之所得，大抵有三种归宿：大多数人的小利只能用于自耗和养家，混迹有年，潦倒归乡，仍是赤贫；一部分人，除自耗养家外，尚有一点积余，但不足以在海外办大事，便弃商归农，携回家乡，略置田产，虽不再是“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赤贫，但也只是一个暂能得到温饱的小农；极少数获利较厚者，回国前或回国后，在本县或温州等地择优买田，或雇人耕种，或出佃收租，自己当起“寓公”来，转化成为过寄生生活的中小地主。反映这一情况的一首歌谣说：“生意兴隆过四海，田买温州上河乡”。上述山口区裘山村一百二十三户中有一百二十五人出国，到一九三二年，他们中的少数人建造了新房子十四座，在温州、平阳、瑞安三地买田的约有十六户，迁居出县的三户。山口区龙现村华侨吴乾奎，由于认识了北洋政府的担任“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一九一五年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中国监督兼筹备事务局局长陈琪（青田县阜山乡人），随展览团运去一批青田石雕，发了大财，并又在美国侨居多年，成为青田华侨的首富。回国后在本乡大兴土木，在温州买了大量田产，成为全县闻名的地主。青田华侨跑码头、闯外洋后，仍然回头走老路，或者又把自己束缚在土地上为自耕农，或者转化成地主，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在华侨中的特殊反映。

第四，经济发展迟缓，处于低下水平。

青田华侨的商贩经济之贫弱落后，在邹韬奋先生的游欧通讯《在法的青田人》中作了具体形象的反映。他说：“这班小贩这样做，每日提箱奔跑叫卖，只须赚得一个法郎（就法国说），就等于中国的两毛钱，每月等于中国的六块钱，倘能赚得三个法郎，每月即有十八元，这在他们的本乡青田固不必想，即在今日的中国，在他们这样的人，也谈何容易！所以他们情愿受尽外人的践踏侮辱，都饮泣吞声的活着，因为他们除此以外更想不到什么活路啊！”（5）青田华侨年复一年地从事小商贩活动，经济不能有起飞机缘，究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除前述的有关方面外，其本身文化素质所限也是显然的。没有文化，缺乏知识，在那样的强食弱肉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极难遇到奇迹的。挣扎着活命就不容易了。又如邹韬奋先生指出：“这种小贩教育程度当然无可言，不懂话（指外国语），不识字，不知道警察的规章，动辄被外国警察驱逐毒打，他们受着痛苦，还莫名其妙”。（6）青田阜山乡下庵店已故老华侨周克孝回忆：他和本乡陈勋南、傅德书一行三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去法国做拎卖生意，由于不识字，不懂语言，形同哑巴，打手势也不能解决问题，生意无法做下去。他们三人陷入困境，走投无路，只得在巴黎街头踟蹰徘徊。

但是，青田华侨作为我们伟大民族的子孙，他们艰苦顽强精神，向为人敬佩，他们同样是四化建设中不可忽视的力量。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他们也在前进，日新月异的变化着。在青田开发建设的伟大事业中，他们正在发挥积极作用。我们研究青田华侨历史的出发点，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个潜在的力量。

（三）新一代青田华侨的基本特点

建国以来，尤其是八十年代出国的新一代青田华侨，其构成、面貌和素质，较之老一辈，已发生很大变化，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出洋目的地比较确定，侨居地趋向集中，加速了华侨社会群体化。

新一代不再是以推销青田石雕出国，漫无方向地闯荡浪迹外域的情形。他们都是由已在海外固定侨居的前辈、先行者作保，并提供路费和初阶段的基本生活、工作条件作保障，通过办理定向入境的国际手续实现移居的。西欧各国和近邻日本，是老一代相对集中的侨居地，青田华侨在那里人数多，基础好，所以就成为新一代的定向移居地。美国和南北美洲为其次，那里比较开放，青田华侨也有一定基础，新移居的也渐次增多。苏联，东欧国家和地区不复再去，有之，为数亦甚寥。东南亚依然如故。这样，新一代的青田华侨比老一代侨居的地区和国家趋向集中，逐步减少了分散的现象，伴随而来的是，青田华侨社会逐渐群体化，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里，青田华侨人数成百、上千。例如，在意大利的青田华侨人数达千人，而且基本上集中在以米兰为中心的北部。米兰市的青田华侨开设的中国餐馆，到处都是，达到饱和状态，在此情况下，青田旅意华侨正逐渐向以罗马为中心的中部以至南部转移。

群体化的趋势，无疑有利于协作、联合，促进小商小贩、小手工业的个体经营结合成多人或多家庭的经济体；有利于贫弱的侨胞克服困难，也利于华侨社会保持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民族意识。

第二,新的出国热中,整个家庭成员同时或分批相继移居的情形普遍化;移居的家庭化必然带来侨居地华侨的血缘化。

随着宗法观念,安土重迁观念的淡化,随着二次世界大战后青田华侨职业结构的变化(从四处奔波从事商贩职业逐渐向经营餐馆业、皮革等业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排华浪潮的低落,更由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走向世界的新潮流兴起,青田华侨全家移居海外的趋势正在迅速发展。一般都是一人先行,立稳脚跟,创造条件,将家庭成员一次或几次带走,完成全家移居的过程。这与以往兄带弟,弟带兄,仅仅是同代同胞相带而不带妻子、儿女的情形不大一样。

亲带亲,故帮故。一个家庭出国侨居后,又以同胞,同宗和联姻关系导致另一个家庭成员进而整个家庭的出国。这样,整家整户外移就日见增多。建国前,那种一个侨胞在海外就有一个侨眷在国内的“一比一”情况发生急剧变化。

既然出国热的形成和出国家庭化的发展,与亲故关系分不开的,那末,那些与华侨(或华侨之家)没有亲故关系的家庭,就很难出国,这就出现通过联姻途径,以家女择婿方法“打入”华侨家庭,成为它的一员或血亲——这已成为青田的一个颇为突出的社会现象。这种现象还波及到县外其它地区的青田移民点。迁居温州的不少青田人就与在青田本乡的侨眷子女联姻,或与回国找对象的青年华侨婚配,然后跟着走。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回国的青田归侨集居地杭州郊区闲林埠,更有一些人与海外华侨直接联姻,或与老家侨眷攀亲结戚,这就使这些老归侨的子女转化为新一代华侨,终又“传子接代”了。

以联姻和宗亲关系造成出国条件,形成出国新热潮,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海外华侨社会的血缘化,产生侨居地的青田籍的家族集团或血亲集团。原青田县财税局工作人员孙××几年前去意大利米兰侨居,办餐馆,经营得法,规模大,赢利厚,条件好,这些年来,孙氏夫妇双方的亲属先后带去的近200人之多。又王氏家族,旅居意大利首都罗马,在我国驻意大利使馆附近办餐馆,也很有起色,他们的亲友也有百人以上先后跟随去的。在意大利北部从事皮革业兼营餐馆业的陈××,一九六九年出国,现在资产可观。出国伊始,四个儿子全都出去,现在他在意的亲属也有百人以上。又如在意大利比萨的吴氏兄弟,先后带走的血缘亲故七十来人。海外青田华侨的血缘化和家族集团,时间愈长,积之愈久,规模亦愈大。权衡利弊,这种新现象,总的说是有利于他们经济协作和的增长,有利于促使商販型、小手工艺型经济向企业型(经济)发展。还应指出,上述第一个新特点,即出国侨居的集中化、群体化,正与这种家庭化、血缘化相辅相成的,在很大程度上,前者是后者促成的。

第三,新一代青田华侨的文化素质有很大提高。

由于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青少年进学校受教育的机会是建国前所不能比拟的。老一代华侨饱尝过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痛苦,希望让子女多读点书。有的让已出国的年幼子女在侨居国上学,学外文,学西方文化,还深以为不足。他们认为,作为根在华夏的华侨、华人,未受中华文化之陶冶,是为莫大之憾事。(6)所以他们大多积极鼓励未出国的子女认真读好书再出国。这样,在新一代华侨中,大多数受过初等或中等教育。

新出国者职业身份的构成,已非为往昔的破产农民和手

工业者，而往往是政治经济地位较好的社会各界人士，包括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工人，企事业单位的职员等等，他们都有相当的文化知识水平。在国外出生的第二、第三代的华侨，他们都受过较好的文化教育。此外“台转外”的原籍青田国民党军政人员和他们的子女。这些人也是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的，特别是他们的子女，受过中等以至高等教育的较为普遍。这三部份人，既改变了青田华侨的社会身份的结构，也改变了青田华侨的文化知识结构，提高了华侨队伍的素质。社会身份结构的变化给侨务工作带来了新课题、新要求，而文化素质的提高，则对华侨自身的发展有极大影响。

有文化的新一代华侨，对外部世界有较深的理解和认识，视野开阔，对发达的西方社会的适应性较强，因而对于学习、掌握现代经济信息，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大为有利，是他们走向世界，走向未来，超越前辈，图强致富的重要条件。他们已走上一条新的经济发展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欧各国，战时经济转向民用经济，五十年代以后，欧美又处相对安定和平的时期，旅游业的发展，对日用品和服务业的要求也不断增长。所以，青田华侨以不要太多的资金办起了餐馆，并经营了设备、工艺要求不太高的而当地垄断资本不能囊括的皮革业；有的人还搞起了家庭缝纫业，制销领带、服装。那些向来零卖小商品的人也改为坐店经商。这样，青田华侨的小商贩型经济逐渐转为较为固定的实业、商业、服务业等多样性的经济，并已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旅意北部华侨工商会会长胡锡珍先生的皮革业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应时而兴的。另一方面，青田华侨自身素质的提高，也有利于他们经济力的增长和发展。新一代华侨不再着眼于谋生养家之道，更不

会走回头路，弃商归农。他们自有新的眼光，新的追求，极力要求走经营现代企业的道路，有的人甚至开始从事现代科学技术。前述孙××夫妇和王氏三兄弟分别在意大利米兰、罗马开设的餐馆，竞雄于服务行业，就是一个例证。一九七九年以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也有青田“三魁”崛起，（鲁家贤、胡蓉江，徐焕然）他们出国后，在前人的基础上，积极钻研经营之道，积累“生意经”，努力改进管理方法，餐馆越办越兴旺。维也纳“青田三魁”已闻名遐迩，受过高等教育尔后出国的周迪贤，周迪光两人，也以较得法的管理手段发展了餐馆业，均成为有相当资产的实业家。周迪光一人就开了七升餐馆。在美国纽约长期侨居的周邦友，已成为上百万资产的中产者，他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在美国念完大学，一人当教师，两人当医师，两个女婿也都是医师。像他家这样的情形，即在侨居国出生的后代受到高等教育，成为文化科技界的专门人才，已逐渐普遍起来，有的已成了颇有成就的专家、经济学家，文化人，个别的进入了政界和军界。被邹韬奋先生誉为富有“冒险的精神”“忍苦耐劳的精神”的青田华侨的后代，不再是“一班可怜虫”，“牛马不如”的小贩，而正以自尊，自力、自强的气概，竞雄于举世瞩目的华人社会。

〔注释〕：

（1）叶中鸣：《青田侨乡探源》，载《青田文史资料》第二辑，

（2）、（3）、（4）、（5）：《在法的青田人》，载《韬奋文集》第二卷《萍踪寄语》初集（第二十五

篇)

(6): 旅法(侨居里昂)青田华侨周锦琰一九八一年
写给亲友的信。

陈 19/11

编者按:

傅雷(1908—1966)是我国著名翻译家,从三十年代起,即致力于法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工作。一生翻译作品三十余部,主要译作有罗曼·罗兰长篇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传记《贝多芬传》《托尔斯泰传》《弥盖朗琪罗传》,巴尔扎克名著《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贝姨》《邦斯舅舅》,服尔德的《老实人》《天真汉》,梅里美的《嘉尔曼》《高龙巴》,巴纳名著《艺术哲学》等。写有《贝多芬的作品及其精神》《评〈三里湾〉》《评〈春种秋收〉》等论文。新中国成立后,曾先后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理事及书记处书记。文革中遭迫害而死。

维护国格的傅雷——

记傅雷赴法留学途中二、三事

洪永川

傅雷是一位著名的文学艺术翻译家,在十年动乱中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他早在二十年代赴法留学途中,就与我交上朋友,时间虽已过去五十多年,但他热爱祖国,刚毅的性格,至今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二十年代,中国大地笼罩着战争和苦难。多年的军阀混战,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支离破碎,人民饥寒交迫,有识之士莫不痛心于国事日非,热血青年都为国家的前途担忧,努力在黑暗中摸索救国之路。傅雷怀着读书救国的强烈愿望,毅然远离故乡,只身跋涉重洋赴法求学。他渴望

吸收法国文学的精华，以富祖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想用他的笔杆拨开祖国的重重迷雾，唤起人民的觉醒。我因受中华益友社之聘赴西欧推销国货，挽回权利，振兴祖国。不约而同，我与他在27年12月3日同乘法国“昂达富·力蓬”号邮船，又都住在三等舱同一房间，因而相识，并成了莫逆之交。

我们乘的邮船，设备相当齐全，船上有电影场、跳舞厅、弹子房、公共消遣大厅以及前后二座游泳池，但傅雷和我，除了每周看二次电影外，从不涉足于舞厅等处玩乐，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观点：出国留学或游历，都是为打开眼界，增长知识。要有学以致用之效，就必须分析好坏，吸收国外好的东西，拿来为我所用，一切有害无益的东西，要实行抵制和防止。跳舞这玩意，虽是西方社交上的一种娱乐，但对我们益处不大，不宜沾染。

他很讲究文明礼貌，为了维护祖国的尊严，不让洋人鄙视我们中国人，他提议我们除各自注意日常生活中要讲究文明礼貌外，还须恪守如下几条：

1. 维护中国人的自重，以不卑不亢的态度对待外国人，一切言行不失国格；
2. 在餐厅等公共场合，不论寒暑都应穿著合时整齐服装，打好领结，内外衣服保持整洁；
3. 按时进入餐厅，席间无故不相离开，进膳时不大声说话，但也不默然用膳；
4. 在餐厅等公共场所，应各自注意姿势和举止，如发现对方有失检之处，应即用华语轻轻提醒，随时改正。

以上几条我们都遵守了，同船的外国旅客都赞扬中国青年很有礼貌和教养。这也是我们在旅途中为祖国争得了一些荣誉。

途中，横跨二大洋和三大洲，还到达为数不少的港口，对我们二个好奇的青年来说，既是感到有些寂寞，又觉得丰富多彩，但依照“行万里路，胜读万卷书”这老来话体味，对我们这些求知的青年还是有益的。因此，为了增长知识，船停靠的港口码头，我们必不失时机登岸浏览，了解各处风土人情，欣赏各地风光景色。邮船到达锡兰（即今斯里兰卡）的科伦坡，我们穿戴整齐上岸游览，他潇洒倜傥，风度翩翩，很多行人怀着好奇和友好的目光望着我们。想不到却遇到有个骄气十足的英国人（当时锡兰是英国殖民地）傲慢地询问我们：“喂，你们是日本人吧！”傅雷听到这样问法，面有愠色，立刻回答：“我们是中国人，是黄帝的子孙”。英国人听了耸耸肩膀，轻蔑地又说：“中国人？不大可能吧？”傅雷气得满脸通红，疾言厉色地驳斥他说：“先生，为什么我们不能是中国人？”“因为你们穿戴时髦，像日本人，不像中国人呢”。听到对方轻视华人，话中带刺地嘲笑，更使我们愤怒，当即反唇相讥，指责对方说：“可惜你见识不广，有眼无珠，把我们堂堂中国人硬说是日本人！”对方感到理屈词穷，自讨没趣，只好说声：“先生们，对不起了。”一边说，一边讪讪地离开了，我们昂首阔步，继续前进。这件事粗看起来，不足为奇，但想到当时中国贫困，华侨被人歧视，很多外国人往往把衣冠楚楚的中国人看成是日本人，亦有一些败类，爱把自己扮成日本人，并引以为荣，实在可耻。我们边走边谈论，越想越气，认为这是对我们中国人的侮辱，游兴顿尽，回到船上，气得连饭都吃不下。傅雷激动地说：“方才的事，欺人太甚，我爱自己的祖国，愿做中国人，祖国虽然贫困落后，但她是抚育我的故土。我们要为祖国争一口气，使她快快繁荣富强起来。”

这样更促使他坚定了献身文艺，唤醒在沉睡中的中华民族的志向。

异国他乡坎坷途

——第三届全国侨联委员

朱祥先生国外侨居生活

纪 实

1985年4月，青田县侨联名誉主席、浙江省侨联常委朱祥先生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侨联委员，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这幸福的时刻，他感慨万千，叙述了旧中国时代，侨居海外十二年的往事。

一、异国谋生

朱祥先生今年七十三岁，一九一三年古历三月十三日出生，青田县油竹下村人。

油竹是驰名中外的青田石雕重要产地之一，也是重点侨乡。早在清末，该村就有人出国贩卖石雕，到了民国初，出去的人就更多。所以这里的穷苦人遭遇不幸，大抵是走出国谋生这条路。人们就这样亲帮亲邻带邻地联袂而去。

他小学毕业后，因无力再升学，就在本村教书，拿一点微薄的束脩金，以助家用。他十九岁结婚，接着添了两个孩子。不久，父亲从法国回来，家境好转没多久，又因钱庄倒闭，存款被吞而使生活再度陷入困境。家庭生活重担压在肩，只得步父亲后尘，出国谋生。

听说波兰的生意比较好做，食品便宜，且有熟人可投靠，朱祥决定先去波兰。费尽周折，凑了三百六十块现洋的